

## 执政者怎样应对危机

### ——大饥荒期间中国领导人的作为

杨继绳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hrow a light on the communist leaders' misguided ac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of Mao Zedong, which resulted in the starvation of millions. It bla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resolutely clinging to the Three Red Banners – three ideological methods for improving China - while not feeding its own people, even when there was clearly enough food in storage to prevent starvation. It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government stored and exported outrageous amounts of food, all while denying the masses the food they themselves had produced. The hardline approach taken by the CCP to stalwartly continue wi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nly undermined China's economy and extended the democide of the Chinese people. Supported by CCP and export-related documents, it makes a strong case for the senselessness and irresponsibility of the CCP.

Under totalitarian systems, no one dares to contradict or criticize the leader. The paper asserts that Mao based his choices and decisions upon falsified reports and did not believe the few accounts that did mention the devastation felt in the countryside. It instead concluded that those hardships were only temporary and isolated. For this reas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asted four years as the CCP hierarchy blindly followed Mao while watching millions of its own people starve to death. It further argues that in this sort of situation, anyone would have made the same mistakes as Mao Zedong as long as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goes rampant.

任何一个政府，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只要有一点理性，面对全国大饥荒的严重危机，总得采取措施应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集团怎样处置危机呢？

他们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他们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在所有制上退让，将一度实行的“公社所有”甚至“全民所有”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二，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甚至要求退回“共产风”时掠夺的农民财产，但真正退赔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三，下放城市职工 2000 多万，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但实际将部分压力转到农村；四，他们认为大饥荒的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通过“整风整社”的政治运动，在农村大搞阶级斗争，把大饥荒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五，1959 年春天允许农民私养家畜和扩大自由地，1961 年开始允许搞责任田，但遇到意识形态障碍，这些扩大农民自由的措施后来都当作右倾加以批判。

当时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

废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其中最主要的是“责任田”（即分田到户，也称包产到户，当时称为“救命田”），在饥饿的逼迫下，责任田在各地的推广面很广。但是，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

在两个方面执政者还执迷不悟，继续坚持错误：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 农民饿死的时候粮库里有大量的粮食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并没有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那样“开仓放粮”，反而继续从农民嘴里剥夺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sup>1</sup>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减少粮食征购上松口。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sup>2</sup>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实际上饿死了100多万人），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sup>3</sup>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1958—1959粮食年度（即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征购数达1125.44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全面出现大饥荒的1959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88.85亿斤，高出比例为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年的征购数比1958年高出103.18亿斤，高出比例为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1960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67.56亿斤。（见表19—1，表19—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鲜血淋漓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

<sup>1</sup>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195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39页。

<sup>3</sup> 《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196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

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 1960 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1961 粮食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 1214.29 亿斤，降低到 780.84 亿斤，降低了 433.6 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 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 342.53 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 164.4 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 269.2 亿斤。

表 19-1 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 征购与销售 | 1957-1958 | 1958-1959 | 1959-1960 | 1960-1961 | 1961-1962 |
|-------|-----------|-----------|-----------|-----------|-----------|
| 从农村征购 | 920.11    | 1125.44   | 1214.29   | 780.84    | 679.14    |
| 销售给农村 | 419.66    | 505.19    | 526.48    | 362.08    | 268.45    |

资料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表 19-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单位：贸易粮，亿斤

| 年度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数量 | 875.80 | 1092.02 | 1195.20 | 852.67 | 682.48 |

资料来源：同表 20-1。

1960 年 1 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 1959 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 1959 年 12 月，已经收到 1142 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 1075.8 亿斤超过了 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 1959 年 12 月 25 日止，已收到 1016 亿斤，完成计划的 94%，再加上 1960 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 1959—1960 粮食年度，收到 1200 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sup>4</sup>在饿死人最多的 1960 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 19-3 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是在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的情况下饿死的。1959 年 4 月到 1960 年 4 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 887.03 亿斤（1959 年 11 月初），最少也有 319.亿斤（1960 年 5 月）。1960 年 4 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 403.51 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 484 亿斤，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可见这个制度何等僵化！官员何等冷漠！

表 19-3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    | 57—58 年 | 58—59 年 | 59—60 年 | 60—61 年 | 61—62 年 |
|----|---------|---------|---------|---------|---------|
| 七月 | 354.85  | 388.94  | 338.79  | 265.88  | 157.46  |
| 八月 | 401.90  | 398.71  | 395.84  | 289.11  | 191.30  |
| 九月 | 486.31  | 417.23  | 503.15  | 341.02  | 234.81  |
| 十月 | 560.21  | 418.12  | 655.21  | 386.93  | 304.95  |

<sup>4</sup> 《中央批转粮食部“关于今后三年内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的报告”，1969 年 1 月 26 日。

|     |        |        |        |        |        |
|-----|--------|--------|--------|--------|--------|
| 十一月 | 690.66 | 658.02 | 887.03 | 540.08 | 460.57 |
| 十二月 | 756.91 | 748.43 | 848.98 | 572.11 | 490.02 |
| 一月  | 725.08 | 714.42 | 764.15 | 510.35 | 438.79 |
| 二月  | 676.75 | 654.56 | 673.19 | 444.50 | 394.88 |
| 三月  | 601.66 | 556.01 | 544.54 | 359.83 | 328.86 |
| 四月  | 507.62 | 433.50 | 403.51 | 267.89 | 257.98 |
| 五月  | 404.53 | 319.00 | 286.22 | 190.86 | 200.92 |
| 六月  | 384.41 | 343.28 | 297.06 | 171.71 | 189.28 |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sup>5</sup>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 农民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食品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sup>6</sup>，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

<sup>5</sup>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数字，1960年7月5日统计。

<sup>6</sup>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41页。

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 2.6 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sup>7</sup>

“突击收购运动”的“断然措施”造成了各地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 1960 年 4 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 7 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 6 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sup>8</sup>

表 19-4 1956—1965 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活畜：万头，活禽：万只，红枣、香菇：吨，其他农产品：万吨，啤酒：万箱

| 种类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
| 粮食 | 265.12 | 209.26 | 288.34 | 415.75 | 272.04 | 135.50 | 103.09 | 149.01 | 182.08 | 241.65 |
| 花生 | 3.85   | 1.93   | 2.86   | 4.24   | 2.66   | 0.62   | 0.42   | 0.81   | 0.98   | 1.19   |
| 油  |        |        |        |        |        |        |        |        |        |        |
| 花生 | 35.04  | 23.93  | 6.80   | 6.44   | 3.45   | 0.05   | 0.39   | 0.33   | 2.66   | 5.83   |
| 仁  |        |        |        |        |        |        |        |        |        |        |
| 鲜蛋 | 2.13   | 3.08   | 3.84   | 1.34   | 1.31   | 1.11   | 2.08   | 2.99   | 3.19   | 3.76   |
| 活猪 | 54.46  | 50.70  | 79.14  | 71.87  | 78.75  | 37.92  | 81.79  | 130.19 | 164.67 | 171.86 |
| 冻猪 | 12.23  | 5.41   | 11.81  | 10.96  | 7.43   | 0.93   | 0.34   | 1.54   | 6.21   | 14.25  |
| 肉  |        |        |        |        |        |        |        |        |        |        |
| 活牛 | 10.72  | 8.76   | 13.50  | 11.55  | 9.48   | 1.12   | 1.64   | 2.46   | 4.98   | 9.33   |
| 活家 | 838    | 1222   | 1455   | 612    | 824    | 492    | 659    | 1044   | 1658   | 2141   |
| 禽  |        |        |        |        |        |        |        |        |        |        |

<sup>7</sup> 在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1960 年 4 月 19 日。

<sup>8</sup>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第 56—59 页，附件三：《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 年 5 月 3 日。四川省档案馆，1960，办公厅，3011，326。

大 饥 荒

|       |      |      |      |       |       |      |      |       |       |       |
|-------|------|------|------|-------|-------|------|------|-------|-------|-------|
| 冻 家 禽 | 4525 | 5890 | 9569 | 4202  | 4755  | 3055 | 2175 | 2963  | 3860  | 4013  |
| 冻 兔 肉 |      | 221  | 802  | 650   | 926   | 643  | 2304 | 3620  | 2431  | 2680  |
| 水 产 品 | 4.49 | 5.78 | 8.85 | 8.62  | 9.46  | 4.23 | 4.60 | 5.94  | 9.25  | 12.00 |
| 苹 果   | 4.76 | 6.67 | 9.24 | 10.11 | 10.75 | 4.99 | 6.35 | 6.02  | 7.53  | 8.06  |
| 桔 柑   | 7.00 | 7.11 | 8.82 | 7.69  | 6.32  | 3.41 | 2.97 | 3.36  | 3.75  | 3.72  |
| 猪 肉   | 0.96 | 1.01 | 3.20 | 2.88  | 1.41  | 0.89 | 0.57 | 1.38  | 3.26  | 3.51  |
| 罐 头   |      |      |      |       |       |      |      |       |       |       |
| 水 果   | 1.46 | 1.88 | 3.81 | 3.40  | 1.96  | 1.92 | 1.83 | 2.62  | 2.75  | 2.52  |
| 罐 头   |      |      |      |       |       |      |      |       |       |       |
| 蔬 菜   | 0.32 | 0.69 | 1.28 | 1.30  | 0.62  | 0.63 | 0.81 | 1.06  | 1.15  | 1.08  |
| 罐 头   |      |      |      |       |       |      |      |       |       |       |
| 啤 酒   | 3.47 | 8.27 | 4.22 | 10.25 | 7.38  | 7.91 | 7.99 | 15.03 | 29.46 | 41.82 |
| 核 桃   | 0.35 | 0.46 | 0.39 | 0.45  | 0.39  | 0.39 | 0.24 | 0.26  | 0.31  | 0.41  |
| 核 桃 仁 | 0.55 | 0.54 | 0.26 | 0.55  | 0.45  | 0.20 | 0.17 | 0.28  | 0.43  | 0.51  |
| 黑 木 耳 | 502  | 491  | 475  | 414   | 331   | 128  | 184  | 269   | 396   | 469   |
| 红 枣   | 1266 | 1158 | 1186 | 1318  | 1147  | 875  | 994  | 806   | 1057  | 1393  |
| 香 菇   | 526  | 224  | 371  | 224   | 179   | 27   | 34   | 58    | 128   | 204   |
| 栗 子   | 0.23 | 0.46 | 0.32 | 0.46  | 0.34  | 0.27 | 0.67 | 0.63  | 0.88  | 1.29  |
| 蜂 蜜   | 0.39 | 0.17 | 0.41 | 0.44  | 0.45  | 0.22 | 0.26 | 0.40  | 0.75  | 1.29  |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47到□-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



其中，猪肉供应出口 23.3 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 2 万吨，为出口计划的 125%；鲜蛋出口 5200 多万斤，冰蛋出口 6208 吨；活家禽出口 954 万只，冻家禽出口 7022 吨。此外，还出口苹果 10.2 万吨，桔柑 9.1 万吨。<sup>9</sup>

表 19-5 1956—1965 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 年份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
| 粮食合计 | 14.92 | 16.68 | 22.35 | 0.2  | 6.63  | 580.97 | 492.3  | 595.2  | 657.01 | 640.52 |
| 其中小麦 | 2.62  | 4.99  | 14.83 |      | 3.87  | 338.17 | 353.56 | 558.77 | 536.87 | 607.27 |
| 砂糖   | 17.61 | 11.93 | 20.91 | 2.6  | 23.38 | 118.66 | 99.56  | 49.69  | 59.88  | 70.79  |

资料来源：同表 20-4。

除了出口食品以外，执政者还慷慨地支持“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 1960 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 1958 年就跟中国要了 50 万卢布。1961 年 2 月 2 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sup>10</sup> 这些，都是从中国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1962 年，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刘少奇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sup>11</sup>

## 饿死人最多的 1960 年继续大搞大跃进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 1960 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 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 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 1959 年“为生产 300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 1800 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 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 1650 万吨。年末实际完成 1387 万吨。1960 年又提出了钢产量 1800 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 1960 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 1800 万吨，而是要搞 2000 万吨。除钢以外，1960 年，在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中，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1960 年，固定资产投资达 416.58 亿，不仅高于 1959 年，还比大跃进的 1958 年高出 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 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 1961 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sup>9</sup> 商业部党组：《关于 1959 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1960 年 1 月 8 日，（60）上海会议文件 97。

<sup>10</sup> 1961 年 4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新闻公报》，1961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

<sup>11</sup>（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王洪起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

表 23-3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 年份   | 总计     | 基本建设投资 |
|------|--------|--------|
| 1954 | 102.68 | 99.07  |
| 1955 | 105.24 | 100.36 |
| 1956 | 160.84 | 155.28 |
| 1957 | 151.23 | 143.32 |
| 1958 | 279.06 | 269.00 |
| 1959 | 368.42 | 349.72 |
| 1960 | 416.58 | 388.69 |
| 1961 | 156.06 | 127.42 |
| 1962 | 87.28  | 71.26  |
| 1963 | 116.66 | 98.16  |
| 1964 | 165.89 | 144.1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301 页。

1960 年 1 月 7 日到 17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sup>12</sup>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 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 1959 年形势更好；确定 1960 年钢产量为 1840 万吨，粮食产量 6000 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风等“五风”又颳了起来。<sup>13</sup>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 1960 年 7 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对 1960 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

<sup>12</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044 页。

<sup>13</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045 页。



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8月和12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186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这次全会还坚持“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产量43,100万吨，比上年增长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工业生产中的被动局面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9月15日），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sup>14</sup>因此，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 极权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极权制度缺乏纠错机制。面对全面危机，纠正错误却迟缓、波折、低效，错误决策者拒不认错，官僚们只求自保。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免犯错误，何况他们的人格并不完美。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演成全局错误。

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没有横向信息的参照，纵向信息就难辨真假。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困难是暂时的，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

<sup>14</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3页。

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饿死人情况已很严重，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1960年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1960年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19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sup>20</sup>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sup>21</sup>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sup>22</sup>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sup>23</sup>这是毛泽东明知自问还是无知？极权制度下只有千人的诺诺，哪能容一人之谔谔？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

<sup>15</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4—46页。

<sup>16</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4—65页。

<sup>17</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2—63页。

<sup>18</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8页。

<sup>19</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4—75页。

<sup>20</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3页。

<sup>21</sup>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sup>22</sup>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sup>23</sup>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

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sup>24</sup>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德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不容易纠正错误。在极权制度下，不让别人执出错误，谁指出错误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彭德怀地位这么高的人那么温和的批评都不能容忍，谁敢批评错误、深入分析错误？谁敢提出扭转局面的政策？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才会有纠正的转机，或是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改变政策；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改弦更张。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他的霸道作风都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但是，仅停留在追究他个人责任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下，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对执政集团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sup>25</sup>

这些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罗隆基的这些话“印发各同志”，作为反面教材。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才是真正的远见卓识！

<sup>24</sup>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sup>25</sup> 《罗隆基最近对物资供应问题的一些反动言论》、《罗隆基妄称目前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